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The Metaphysical Club

美国观念的故事
A Story of Ideas in America

哲学俱乐部

[美] 路易斯·梅南德 著
肖凡 鲁帆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普 利 策 奖 获 奖 图 书

哲学俱乐部

The Metaphysical Club

美国观念的故事

[美] 路易斯·梅南德 著
肖凡 鲁帆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俱乐部：美国观念的故事 / [美]梅南德著；肖凡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8

ISBN 7-214-04402-1

I. 哲... II. ①梅... ②肖... III. 实用主义-哲学史-研究-美国 IV. B0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6652 号

The Metaphysical Club: A Story of Ideas in America

Copyright © Louis Menand, 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6 by JSPPH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5-168

书 名 哲学俱乐部——美国观念的故事

作 者 [美]路易斯·梅南德

译 者 肖 凡 鲁 帆

责任编辑 厉 玲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2 插页 2

字 数 313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402-1/B·139

定 价 2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献给我的父母和吉尔达

序

美国经受一场内战,但其政府形式却没有改变,这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内战期间,人们没有抛弃宪法;选举正常进行;政变没有发生。美国内战目的就是保留国家建立之时所创设的政府体制——其实,它更为证明这种体制值得保留,证明民主理念没有失败。这也正是葛底斯堡演说和北方伟大的战斗口号“联邦”的内涵。政府体制得到保留;联邦制度也得以幸存。但除此而外,美国几乎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内战本身没有实现美国的现代化,但它却标志着现代美国的诞生。

美国内战既是政治事件也是经济事件,其带来的社会巨变既不难发现也不难解释。南方脱离联邦之后的四年中,北方可以在不受南方干预的情况下制定国家扩张计划,战时国会紧紧抓住这个机会。战时国会是美国历史上最为主动的一届国会,它支持科学教育和研究;它建立第一个全国税收体系,发行第一套影响深远的国家通货;它创办公立大学,铺设横贯大陆的铁路;它促使联邦政府出台种种政策,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发展;它帮助北方赢得内战。南部邦联的军事失利使得共和党成为1865年以后美国政治舞台的主导力量,共和党主张大力发展工商业。此后30多年,强大的中央政府保护并促进了工业资本主义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我们称为“现代”的生活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内战的结果如同林肯所希望的——确证了美国的民主实验。但有一点除外,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们不应通过彼此杀戮来解决争端。对于亲历内战的一代人而言,这是一次可怕的、伤痕累累的经

历。内战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对部分人而言,战争不仅是民主的失败,更是文明的失败,思想的失败。如同其他生灵涂炭的战争带给人们的伤害——60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欧洲人的伤害和100年后的越南战争带给美国人的伤害。内战以后,人们开始质疑原先的信念和设想。它们没有阻止战争的爆发;没有预见战争中骇人听闻的暴力杀戮;在战后社会中,它们显得荒谬陈腐。南方的奴隶制度因内战而消亡,北方的思想文化体系也几乎遭遇同样的命运。大约半个世纪以后,美国人才重新发展一种文化取而代之,发现帮助人们应对现代生活环境的一套思想体系和一种思维方式。本书所讲述的正是战后美国走向现代的奋斗历程。

讲述这段历史的方法各异。本书以四位人物的生平为线索,他们是: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威廉·詹姆斯、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和约翰·杜威。他们个性极其鲜明,他们并不总是彼此认同,他们的职业生涯多次交汇;作为整体,在推动美国现代思想形成的过程中,他们的贡献超越其他任何组织。他们不仅对其他作家和思想家产生了空前的影响,而且对美国生活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的思想改变了美国人的思考方式,进一步而言——关于教育、民主、自由、正义和宽容的思考方式。从而,他们也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表达观点的方式、自我理解的方式和对待异己人士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些思想家努力构建的国度之中。

强调霍姆斯、詹姆斯、皮尔斯和杜威以及他们所作贡献的重要程度,关键之处在于知性文化的本质。其实,这也是他们精神遗产的组成部分。思想有别于封闭的思想体系。认为霍姆斯、詹姆斯、皮尔斯和杜威是美国第一批现代思想家,他们帮助美国人更好地适应现代生活环境,并不等于承认他们的思想就是对现代生活环境的正确回应。事实的确如此。但也不能说他们的思想与现代生活环境形成根本对立。如果我们从其他角度考察内战之后几十年间美国的社会生活,也许会忽略霍姆斯、詹姆斯、皮尔斯和杜威。毫无疑问,这与他们的性情和政见有关,但这也是他们对待思想的态度所致。

这是一种怎样的态度？如果排除他们之间个人的和哲学的差异，我们可以说四位思想家的共同之处并不在于一套思想体系，而是在于一个理念——关于思想的观念。他们都认为思想不是等待人们发现的“客观存在”，而是工具——如同刀、叉和微型芯片一样——人们发明思想用来应对生活其中的世界。他们认为思想不是产生于个体，而是产生于群体——思想具有社会属性。他们认为思想的发展并不依赖其内在逻辑，而是像细菌一样完全依赖拥有思想的人和社会环境。他们认为，既然思想是对特定的、去而不返的环境所作的暂时回应，那么思想能够得以流传并不在于它们是否亘古不变，而是在于它们能否适应社会环境。

思想永远不应成为封闭的思想体系，不管是证明现实存在的合理，还是借口先验义务拒绝接受现状，这正是他们说教的精华所在。这种全面的自由态度，正是霍姆斯、詹姆斯和杜威（皮尔斯是个特例）一生享有盛名的原因所在，也是他们影响整整一代法官、教师、记者、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家、法学教授甚至诗人的原因所在。他们宣扬一种怀疑论，帮助人们应对异质的、工业化的、市场发达的社会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依靠习俗和社区维系人际关系的传统手段似乎已经削弱，代之以冷漠而复杂的义务和权威。但是怀疑论也是促使此类社会正常运转的特质之一。允许变化不断发生，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繁荣。霍姆斯、詹姆斯、皮尔斯和杜威帮助人们解放思想，不囿于既成的思想体系，不囿于教会，不囿于政府，甚至不囿于学术机构。尽管如此，他们在著作中含蓄地承认，在争取幸福的过程中思想发挥的作用有限。

本书力图按其本来面貌记述这些思想，尽量将思想与特定个人和特定社会环境相联系，尽量恢复历史原貌。霍姆斯、詹姆斯、皮尔斯和杜威都是哲学家，他们的著作是抽象思想史的组成部分。这些著作的哲学价值当时就存在争议，今天仍是如此。本书无意讨论哲学问题，只求解读历史。通过知识界提出的种种理论，本书描述美国社会的变化。这些理论因国家的变化而变化。凡有变革，皆有得失。如果本书讲述得当，可能有助于更好地权衡得失。

目 录

序 1

- 第一章 奴隶制度存废之争 1
- 第二章 废奴主义者 18
- 第三章 旷野战斗及其后续 40
- 第四章 拥有两种思想的人 58
- 第五章 阿加西 78
- 第六章 巴西 95
- 第七章 皮尔斯家族 122
- 第八章 误差法则 144
- 第九章 哲学俱乐部 164
- 第十章 伯灵顿 192
- 第十一章 巴尔的摩 209
- 第十二章 芝加哥 236
- 第十三章 实用主义 279
- 第十四章 多元主义 314
- 第十五章 自由 343

跋 364

致谢 371

第一章 奴隶制度存废之争

—

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是联邦军队的军官。他身高六英尺三英寸,颇有军人风度。退役以后,在演说和谈话中他仍喜欢运用军语打比方;他也不介意人们善意的称他“霍姆斯上尉”;直到1935年去世,享年93岁,他一直留着浓密的军官胡子。内战是他一生最重要的经历,他一直刻骨铭心。每到安蒂特姆战役周年纪念,他都会斟上一杯葡萄酒追忆往事,在那次战斗中,他颈部中弹,滞留敌人后方,生死未卜。

霍姆斯憎恨内战。他参加的第一次战斗发生在布尔斯悬崖,当时他只有20岁,体重仅136磅。在战斗中,他胸部中弹。霍姆斯作战勇敢,性格开朗,却不够强壮,随着战事的推进,他渐渐感到体力不支。他先后三次负伤,最后一次是在钱瑟勒斯维尔战役刚刚打响的时候,当时他的脚部中弹。他希望能将受伤的脚截掉,从此退役,但这只脚还是保住了,他也服完了整个兵役。他的很多朋友都在战斗中牺牲,有的甚至就倒在他的眼前。这每一杯酒都是与痛苦往事的干杯。

霍姆斯的伤口虽然愈合了,但是心中的阴影却永远无法抹去。他参加内战完全出于执著的道德信念。而这场战争不仅使他抛弃了那些信念,也使他不再相信任何信念。战争让他深刻领悟到信念是具有局限性的。这是他终生秉持的信条,因而他显得严格冷酷,有时甚至玩世不恭,这让那些研究他的生活和思想的人偶尔产生厌恶情绪。但是战争结束多年以后,正是这种信条成为他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助理法官时作出若干判决的根据。想要了解霍姆斯作出这些判决之前的人生经历,想要描述这些观点以了解霍姆斯的发展历程,我们不得不回到一个战后被人遗忘的城市,内战之前的波士顿。

二

我们认为,内战既保住了联邦体制,又废除了奴隶制度,但战争开始前,多数人认为这是两种不可调和的社会理想。想要保存联邦体制的北方人不希望看到奴隶制度扩展到北方地区;有些北方人希望奴隶制度能在各州自行消亡。很多北方商人认为失去南方将会造成经济灾难,很多北方工人认为解放奴隶将会导致工资下降。他们对南方脱离联邦的害怕远远胜过他们对奴隶制度的厌恶,他们不敢冒着失去南方的风险迫使南方废除奴隶制度。

废奴主义者不考虑联邦的未来。“如果你的右手侵犯了你,就砍掉它”是他们宣扬的信条。他们鄙视联邦主义者,认为联邦主义者将自身利益凌驾于正义之上,他们认为除了废除和隔离之外,其他任何措施都是与魔鬼的交易。他们抨击联邦主义者伪善和贪婪;而联邦主义者谴责废奴主义者迫使南方分裂,设法将他们赶出城外,有时甚至杀害他们,以示反击。在北方向南方开战之前,北方内部已经开始了战争。

霍姆斯的父亲,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博士(Dr. Oliver Wendell Holmes, Sr.)是个联邦主义者。自清教徒时代以来,霍姆斯家

就和新英格兰的望族——奥利弗家、温德尔家、昆西家、布雷兹特里特家、卡伯特家、杰克逊家和李家等关系密切,但他们并非特别富有。霍姆斯博士是教授;其父艾比尔(Abiel)是牧师;他认为自己是新英格兰的文人雅士(他杜撰的词),这个词用在他身上,不仅意味着他拥有良好的家庭出身,而且表明他是个学者,也就是我们所谓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的思想融合了启蒙思想和国教传统思想:他在不断拓展知识的同时依然固守着自身文化。

霍姆斯博士成名于1830年,是他从哈佛毕业后的那一年,当时他发表了一首广受欢迎的诗《铁甲古舰》,抗议拆解“宪法”号军舰。大学毕业后他尝试学习法律,但很快转向医学。1843年当他34岁时,他来到巴黎学习,并且发表一篇关于产褥热形成原因的论文,该论文在细菌致病理论中具有划时代意义。(他提出产褥热的传播根源在于负责接生的医生,这篇文章在医疗机构引起很大争议。)他执教哈佛医学院,后来担任该院院长。但是他的名声主要来自文学创作活动。他是星期六俱乐部的首批成员之一,这是一个文学交流协会,其成员包括爱默生、霍桑、朗费罗、小理查德·亨利·达纳、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和查尔斯·爱略特·诺顿等。他参与创办《大西洋月刊》,不仅设计了刊物名称,而且在月刊上发表了深受读者欢迎的专栏摘要,“早餐桌上的独裁者”(接着又发表了“早餐桌上的教授”和“早餐桌上的诗人”)。他写下几百首诗和三部小说。许多人,包括波士顿人,都认为他是最伟大的演说家。

但他具有排外心理,并且不加掩饰。他的雄心壮志就是在所有的事情上展现波士顿人的观点。(他患上哮喘,不便四处游历。)而且,他认为波士顿人的观点是唯一值得展现的观点。他认为波士顿是“这片大陆的思想中心,因而,也是这个星球的思想中心”。他如此描述:“波士顿议会是太阳系的中心。”这个短语后来成为这个城市的昵称。他反对加尔文主义(这是他父亲艾比尔的信仰),是个唯理论者,但他同祖先一样坚信良好的教育,他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挑战这个世俗社会的建立基础,因为

在过去两个多世纪里,教育成功塑造了许多如他一般的友善而又多才的人。

霍姆斯博士的政治观点大多自发形成:他从个人直觉和社会主流趋势中获得启发,当两者冲突时,他会附和主流趋势。如1850年,他担任医学院院长时,有个名叫马丁·德莱尼(Martin Delany)的黑人为申请入学而来找他。德莱尼是个出色的人。他与弗莱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一起,创办了美国黑人的主要报纸《北极星》;后来他写作一部名为《布莱克》,也被称为《美国小屋》的小说,回应《汤姆叔叔的小屋》。他曾在联邦军队担任少校一职,这是内战期间美国黑人所获得的最高军衔。到1850年,德莱尼已经38岁,完全符合医学院的入学资格,但在申请入哈佛大学之前,他已经被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内的四所学校拒绝。

两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黑人,小丹尼尔·兰恩(Daniel Laing, Jr.)和艾萨克·斯诺登(Isaac H. Snowden),碰巧也在同一年申请入学——哈佛医学院。兰恩和斯诺登得到美国殖民协会资助,该组织提倡将美国黑人移居利比里亚以解决奴隶问题。两人承诺一旦获得学位就移居国外;而德莱尼明确表态将在美国行医。霍姆斯认为没有理由不接受这三个学生。而且他还打算接收同样来自波士顿的第一位女生哈里特·亨特(Harriet Hunt)进入哈佛医学院(在她不参加解剖课的前提下)。尽管他认为对妇女而言,多数教育都是浪费。(他曾勉强承认,只有少数几位女性能够从教育中获益,如德斯塔尔夫人。“即使受过教育的女性也无法否认这个观点。”)

医学院的学生一致反对霍姆斯博士的决定。他们告诉教师,他们反对妇女出现在课堂上,同时黑人德莱尼、兰恩和斯诺登也都遭到排斥。到12月,60多名学生(多半学生)举行集会并且通过请愿书表示决心:“我们拒绝与黑人做同学;在街上,我们不会与他们结伴而行;在屋内,我们无法忍受与他们共处,”并且,“这个邪恶的开始已经让我们气愤不已,如果不加以阻止,情况就会更加糟糕,黑人学生的数量将会超过高贵白

人学生的数量”。另有 48 名学生(人数略少)提交了反对请愿书,指出形势令人不快,“他们认为更加严重之处在于,依照公众目前的心理状态,波士顿任何一所医科学院都可能将这类不幸学生拒之门外,而且他们完全有权利这么做”。

全体教师连续两晚在霍姆斯博士家里开会。起初他们态度坚决,但是得知一些白人学生意欲转学的消息后,他们做出让步,要求霍姆斯通知美国殖民协会“这次混班教学实验让医学院全体教师相信种族之间的融合令大部分学生反感,而且有损学校的利益”,并且表示将来不会接受黑人学生的入学申请。德莱尼、兰恩和斯诺登不得在下个学期注册。哈里特·亨特听从教师的劝告,收回她的入学申请。霍姆斯觉得接收这些新学生没有什么不对,但当他的同事们一致认为这样不妥时,他似乎觉得不接收这些学生也没什么不对。

兰恩最终在达特茅斯获得学位;斯诺登返回原籍,私下跟随马萨诸塞总医院一个外科医生学习。1853 年,他再次向哈佛大学提出申请,再次遭到拒绝。德莱尼在原地观望。他希望他的遭遇能够引起波士顿废奴主义者的注意,当时他们代表因 1850 年《逃奴法》的实施而被追捕的逃跑奴隶们,与对手展开一系列的公开较量,同年 10 月,德莱尼到达剑桥几周之前,西奥多·帕克(Theodore Parker)牧师领导的波士顿治安委员会将试图抓捕一对黑人夫妇(威廉·克拉夫特和艾伦·克拉夫特)的两个密探赶出城外,这对夫妇伪装成一个白人绅士和他的男仆才得以逃出佐治亚州。1851 年 2 月,曾经是奴隶的一个名叫沙得拉的黑人侍者在波士顿一家咖啡馆被捕,随后废奴组织突袭了囚禁此人的那个联邦法院,制服了联邦地区执行官,并且将他安全送上通往加拿大的地下铁路(最后他在那里开了自己的餐馆)。但是,同年 4 月,300 名士兵和武装分子趁着夜深人静,顺利将另外一个佐治亚州的逃奴(17 岁的托马斯·西姆斯)押到一艘停泊在波士顿港口的船上,这艘船会把他带回原先的奴隶生活。

然而,废奴主义者没有抗议哈佛医学院拒绝兰恩、斯诺登和德莱尼

的行为。(也没有人同情哈里特·亨特的遭遇。哈佛医学院直到 1945 年才开始接收女生。)原因之一在于废奴主义者不赞同美国殖民协会的改良政策,也不愿替他们打抱不平。但德莱尼发现,同北方黑人所遭遇的歧视相比,废奴激进分子们更加反感南方擅自派遣密探进入北方城市夺回“财产”的行为。他的判断完全正确。在战前的波士顿,如何对待奴隶制度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三

1820 年左右,波士顿以北的梅里马克流域兴起许多工业城镇——黑弗里耳(Haverhill)、劳伦斯(Lawrence)、洛厄尔(Lowell),它们完全以南方的棉花作为原料,将其制成产品后,再同鞋类、机器零件、橡胶制品和其他产品一道卖给南方。这种依赖是双向的,因为南方没有真正的工业生产基地。到 1860 年,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所拥有的棉纺锤数量超过后来组成南方邦联的 11 个州的棉纺锤数量总和。到 19 世纪中叶,波士顿已成为国内金融服务中心,并将大量资金投入这种特殊的国内双向经济。麻省的商业领袖和政治领袖都无意对抗南方;对废奴主义者而言,波士顿金融业中心所在地斯泰特街已经成为绥靖政策的代名词。

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是斯泰特街的英雄人物,他在联邦参议院发表了“3 月 7 日演说”,援用整体高于部分的原则,为 1850 年的《妥协法案》(*The Compromise of 1850*)扫清了障碍。该法案其实是涉及奴隶制度在新获领土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地位问题的系列法案,南方对此非常满意。该法案也回应了南方加强针对逃奴立法的要求。自 1793 年起,就有法律规定奴隶主对逃往其他州的奴隶享有财产所有权;根据妥协法案,联邦首次负责实施这些法律,也就意味着南方奴隶主可以加入联邦执行官和联邦地方法官的行列,共同追捕逃到北方的奴隶,从而超越地方官员权威和北方各州的“自由法律”。

新的《逃奴法》在 1850 年《妥协法案》中并未引起争议,却使北方更加激进地反对奴隶制度。它促使许多消极的联邦主义者开始积极的抵制南方,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该项法案侵犯了美国黑人的自由,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该项法案侵犯了北方白人的自由。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 S. Grant)临终前写道,这是“北方不能容忍的倒退”,而且他认为这是内战的主要导火索:“只要不被强迫实行奴隶制度,绝大多数北方人都不愿特别反对奴隶制度。但他们不愿为保护南方这种特殊制度而扮演警察角色。”

即使没有人提倡废除奴隶制度,北方人也可能因此憎恶并且抵制《逃奴法》。比如,理查德·亨利·达纳(Richard Henry Dana)虽然认为自己政治保守;但他却甘冒生命危险,代理逃奴和逃奴的保护者在波士顿的联邦法庭作辩护发言。因此,他不仅在街上受到袭击;在社交上也受到冷漠,如同他的朋友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此人曾在法纳尔大厅发表演说,公开谴责《妥协法案》属于源自古罗马时代的“民族罪恶的永久记录”。乔治·蒂克纳(George Ticknor)是波士顿上流社会的焦点人物,在达纳作为西姆斯辩护律师出庭以后,他给达纳送去一张便条,声称两人永不相见。就在一年之前,他还曾将避暑房屋租给达纳。

蒂克纳是战前波士顿社会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职位与商界、法律界和学术界都有联系。他的父亲是位相当成功的商人;他的岳父塞缪尔·爱略特(Samuel Eliot)是位非常成功的商人。他的侄儿乔治·蒂克纳·柯蒂斯(George Ticknor Curtis)是位律师,后来成为监督《逃奴法》实施的联邦政府专员;曾极力促成将托马斯·西姆斯送回奴隶生活之中。乔治·柯蒂斯的弟弟本杰明是位法官,曾宣判沙德拉的救助者有罪;由于韦伯斯特的推荐,他很快成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助理法官。这三个人都是丹尼尔·韦伯斯特的密友。但乔治·蒂克纳本人既不是商人,也不是律师。他曾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先后在达特茅斯和欧洲接受教育。他是教育改革家,研究西班牙文学的学者,慈善家,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创始人之一。他对奴隶制度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家中亲戚和社

交圈内朋友的影响,但他的观点也代表了哈佛唯一神教派(Harvard Unitarian)的观点。

自从1805年亨利·韦尔(Henry Ware)担任哈佛神学院的霍利斯(Hollis)教授以后,唯一神教便在哈佛大学占据统治地位,唯一神教的信仰基础是人性本善(与之相反,加尔文教的信仰基础是人性本恶)。从许多方面看,唯一神教的教徒都会自然反对奴隶制度。突袭联邦法院救出被捕逃奴的废奴组织的领导者——西奥多·帕克和托马斯·温特沃思·希金森——就是唯一神教居主导地位了的哈佛神学院的毕业生。但是许多信奉唯一神教的哈佛教授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属于社会保守派,相信法律和秩序,认为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

威廉·埃勒瑞·查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①是波士顿唯一神教的牧师代表,他的出生和婚姻都和新英格兰商界精英相联系。他的父母拥有奴隶;他的岳父乔治·吉布斯(也是他的叔叔)依靠酿造朗姆酒卖给奴隶贩子而大发一笔。1835年,就在波士顿的一个暴徒企图用绳索套住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游街示众的那一年,查宁出版了一本名为《奴隶制度》(*Slavery*)的宣传册,同时谴责奴隶主和废奴主义者,并且提倡通过道德说教而非高压政治促使南方放弃奴隶制度。

多年以来,这个观点一直代表自由唯一神教派(Liberal Unitarian)的立场,不仅在哈佛这样的地方,而且在查宁自己的教区(位于波士顿联邦大道)也是如此。查宁的密友查尔斯·福林是个德国学者,因为反对奴隶制度的行为而被哈佛大学解雇(他还因教师言论自由和校方闹翻)。1840年福林在轮船火灾中丧生后,普通信徒不允许查宁在教堂内为他的朋友举行悼念仪式。科尼利厄斯·康威·费尔顿(Cornelius Conway Felton)是哈佛的希腊语教授(也是星期六俱乐部成员),后来成为哈佛大学校长,他支持奴隶制度,反对煽动废奴运动。因为萨姆纳对1850年

^① 威廉·埃勒瑞·查宁(1780—1842),美国宗教领袖,其作品和布道促进了唯一神教的兴起。(译者注)

《妥协法案》有不同看法,他就与密友萨姆纳分道扬镳。他是哈佛教师之中唯一应征参加内战的,他还是德国移民。

尽管斯泰特街的人们对达纳和萨姆纳唯恐避之不及,但他们在波士顿地区还是拥有政治盟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亚当斯家族。总统任期结束以后,担任国会议员期间,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曾经坚定地却孤独的反对奴隶制度。从1834年初开始,国会对于收到的所有反对奴隶制度的申诉可以不经讨论而直接搁置,他曾长期而且强烈抗议这种所谓的申诉审查规定,以至于其他国会议员企图因此而责难他。(但是他们未能成功。)他和他的父亲约翰·亚当斯都是因为失去南方的支持才没有赢得总统第二任期,他的儿子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于1848年代表自由领地竞选副总统。

达纳、萨姆纳和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都反对奴隶制度,但都不是废奴主义者。他们属于良心辉格党(Conscience Whigs)。他们相信可以通过政治制度防止奴隶制度扩展到新的州和领地,抵制南方的政治勒索(他们将南方推广奴隶制度的要求视为政治勒索)。相反,废奴主义者不相信通过政治制度可以防止奴隶制度的扩张,因为他们不相信政治制度。他们似乎也不相信政治,但这并不准确,因为废奴主义者适当调整政治纲领以后,最终在政治上大获全胜。废奴主义者并非不关心政治,放弃政治是他们获得成功的秘诀。

废奴主义兴起于第二次大觉醒运动,这场福音派的复兴运动于1800—1840年间先后席卷了新英格兰地区和纽约州北部,同时触发了禁酒运动、女权运动和其他社会改革运动,参与其中的还有乌托邦派和其他宗教派别,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摩门教派。因此,废奴运动的基础是精神的、反对现存制度的。对于不相信宗教派别的人而言,废奴主义就是一个派别,这是个自相矛盾的吸引规则,但它却非常适应融合唯一神教思想和超验主义思想,总体而言仍为后加尔文主义的新英格兰文化,这种文化日益注重个人良心的道德威信。美国废奴协会(The 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是废奴运动的组织机构,它的成员相对